

新闻调查与 揭秘

腐败曝光，调查记者功不可没

安德烈亚斯·阿德里亚诺

1971年，揭秘者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发现了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他耗费大量的时间复印了7000多页资料，并将其透露给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四十年后，德国记者巴先·欧伯马尔（Bastian Obermayer）收到一个匿名人士寄来的U盘，其中存有巴拿马一家律所的1100万份文件。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富人和权贵的不正当交易及避税计划。由于文件数量巨大，即便欧伯马尔用上全编辑部的设备也无法处理，于是他向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求助，来自90个国家

的250名记者伸出了援手。

这些资料，即《巴拿马文件》，于2016年4月被公诸于众，将全球经济背后那些涉及面广泛、复杂而隐秘的交易悉数曝光。这一丑闻导致不少总理、首相和高级官员相继落马，从爱尔兰到蒙古，涉事国家不胜枚举。

从《五角大楼文件》到《巴拿马文件》，以及其间曝光的其他重要内容，调查性报道对揭露机密和丑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并非一条坦途：尽管当前可调查的领域日益增多，但愿意公布调查结果的机构却不断减少。全球对传统媒体的扼杀有案可查。一项研究显示，2004年，仅美国就有1800种地方报纸停版。互联网等技术虽然提供了新的平台，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与之前的内幕人士良心发现而揭发机密不同，现今的许多揭秘都是黑客入侵的结果，这引发了伦理和法律问题。

查尔斯·路易斯（Charles Lewis），常被人称为“查客”·路易斯（Chuck Lewis），在其职业生涯中亲眼目睹了调查性报道的兴衰。水门事件丑闻期间，路易斯是一名参议院实习生，后来又与传奇人物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共事，最后，他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资深调查性新闻制片人。1989年，路易斯辞职创办公共诚信中心。多年后，他又创办了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当前活跃在美国的200多家非盈利新闻组织中，有一部分是在路易斯的帮助下创建的。路易斯目前担任华盛顿美利坚大学新闻学教授兼调查报道工作坊执行总监。《金融与发展》的记者安德烈亚斯·阿德里亚诺有幸对其进行了采访。在采访中，他与阿德里亚诺分享了自己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比如对金融问题的调查、新闻机构发展前景惨淡的问题，以及作为新型揭秘者的黑客所引发的伦理问题等。

地方报纸几乎已经全部停版。这对地方层面的新闻调查会产生何种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我开始进入职场，最初是在位于特拉华州的《威明顿新闻报》编辑部的体育部工作。《威明顿新闻报》是中小型报刊中的佼佼者。但是，他们经营不善，员工人数从过去的187名减少到目前的35名。就当前而言，新闻记者人数与1972年没有变化，而联邦预算已增长了近两倍。在美国，赋闲的记者人数高达数万名。美国的多数法律都是由州政府制定的，但是州首府的记者人数却不到三分之一。在华盛顿，没人会报道27个州的国会议员的情况。此外，在美国

还有一种我称之为“新闻荒漠”的现象，没有媒体每天专门播报地方新闻，无论是电台还是地方或州报纸，而且这种现象十分普遍。

有可能知道未报道的新闻吗？

不可能的。华盛顿有超过 100 家联邦新闻社。《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精英媒体不会报道所有新闻。有时，你可能会从不知名的简讯中获得想知道的新闻。简讯的数量成千上万，覆盖各行各业的新闻，而且它们可能仅代表个人的兴趣。

这对金融与经济新闻报道会产生哪些具体影响？

实话实说，我担忧的是，能获得实质信息的人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他们会订阅主流媒体的新闻，并从头到尾仔细阅读。当然，他们这么做的部分目的是为了赚钱。然而，其他民众，包括受过教育的人，并没有付出同等的时间和精力阅读或消化新闻。对于有实质信息的资料，阅读与不阅读不可同日而语。

非营利新闻组织的建立是为了弥补记者的失业情况吗？

美国目前有 205 家非营利调查性新闻组织和 27 家国际组织。近年来，慈善机构和慈善家纷纷崛起，他们捐赠了 10 多亿美元来报道某些地区的地方报纸不能再报道的地方新闻。这种做法不是为了弥补新闻机构的缺失和记者失业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本来更为糟。据我估计，这些非营利组织目前拥有的记者人数高达 3000 人。

2008 年左右，由于申请人数下滑，普利策奖开始同意非营利组织提交申请。我创办的两家组织——公共诚信中心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都荣获过普利策奖，而 ProPublica 等非营利组织获奖的次数目前已高达十几次。

目前有很多调查性报道都是基于黑客入侵这种违法行为展开的，而不是由揭秘者良心发现而揭发的，比如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揭秘的《五角大楼文件》。这种现象是否让您感到困扰？

首先，就《巴拿马文件》而言，没人知道谁是真

正的揭秘者，可能是黑客，亦或是知晓内幕的人士，比如对当事方不满的员工，或认识内部人士的人。对于此事，不久就会有新书出版或电影播出，届时，我们可能会获得更多信息。

从广义而言，这其中存在着灰色地带。前段时间，在欧洲的一次调查性报道大会上，组织者有意将我和《纽约客》杂志的调查记者西莫·赫希（Seymour Hersh）以及其他一些知名记者和黑客安排在同一张桌子享用晚宴。能和他们交流真是幸事。其中有些黑客的入侵目标十分明确，因为他们认为社会出了问题，或者认为某公司有保护伞，这就像一位政府雇员因为看到某些内容之后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所以就开始泄密。

我知道有些黑客是为了钱而做违法之事的。同样地，其中也存在着灰色地带。如果的确存在权力滥用，且只有通过泄露的方式才能让公众知情，那么揭秘不是件好事吗？《五角大楼文件》公布后，马上就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等待五角大楼采取行动，那他们仍将秘而不宣。

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存在权力滥用。我必须首先承认的是，我是一名调查性记者，而且我认为公众有知情权。但是，具体事情要具体分析。有时候，人们的确是出于自己的良心在做事，而且他们的揭秘对整个社会而言可能是有益的。

如果您有机会建议政府提高透明度，您会说什么？

我认为，每个民主政府或略有责任感的政府都应密切关注离岸司法管辖问题。如果美国特许的银行在美国的 60—90 个离岸司法管辖区从事未经法律允许的业务，或可能甚至直接进行违法交易，那么美国政府、国会及国家税务局就应为此感到焦虑。可现实却恰恰相反，每个人似乎都对此不甚关心。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此，上述所有机构都需加大相关讨论和报道，加深理解，并增强责任感。FD

安德烈亚斯·阿德里亚诺（ANDREAS ADRIANO）是IMF信息交流部的高级官员。

由于篇幅所限且为了表达得更清晰，本文对采访稿进行了编辑。